

讲好老区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运城日报 合办

打得日寇胆颤心惊 冒死往来苏区白区

王国：“无硝烟战场上的勇士”

王国（1914—2001），乳名三喜，学名建基，稷山县西社镇李老庄村人，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甘肃省定西地委书记，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顾问。

王国出生于稷山县李老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到绛县横水镇当打井工人。1933年春节，他为躲避逃往西安，在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警卫团留守处特务连当兵。

当时的西北军中早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张汉民等一些共产党员还在西北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国当兵后，被分配到留守处看守所站岗放哨。当时，李鼎铭（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因给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购买枪支被关押在这里，二人很快成为了朋友。

为了营救李鼎铭，王国遭到上司的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不仅被官兵称为“硬汉子”，还被党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1933年10月，王国在同事马文学、岳之涛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王国长期隐蔽并以合法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3年至1936年，他历任警卫团三营七连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特二团党委书记。其间，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他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多次护送来往于苏区和西安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义活动，亲身经历了张汉民被误杀事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率部坚守赤水桥，阻击西进的“中央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阻击任务完成后，特二团在耀县整训时，按照团党委决定，让王国以“设宴请客”为名，处决了无恶不作、残害进步人士的恶霸特务头子雷天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国随所在团赴河北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战役和忻口战役。忻口战役后，部队奉命撤退到运城一带，组成抗日游击总队，王国任副中队长。随后，他任闻喜县抗日自卫队中队长、总指挥、总队党支部书记。1939年1月任三十八军四十六旅党的特派员。其间，他多次采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袭击敌人，打得日寇胆颤心惊，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捉拿王国。

1941年年初至1945年年底，王国

奉命调至陕西省委统战部，先后任总务科科长、生产科科长、招待所所长等职，从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

5年间，他多次装扮成“商人”或“旧军官”，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苏区和白区之间，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还建立了许多联络点和统战关系，被称为“无硝烟战场上的勇士”。

1945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王国被捕入狱。

面对利诱他不为所动，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骨气。经组织营救，他脱险回到解放区。

1945年年底，王国奉陕西省委命令，参加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策动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活动，从事联络工作，亲自组织营救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州，并将其安全送到解放区。

1946年10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华北等解放区的进攻，王国受命建立郑州情报站，担任站长，为我军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还出色地完成了与原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和党员干部的安置工作。

1948年4月，王国正式调回解放区，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隐蔽斗争历史，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他曾任陕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安康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其间，他组织策动安康守敌起义，和平解放安康城。

此外，他结合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2年“三反”运动中，王国受冤挨批，纠偏后先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劳改第二支队政委，宁夏湖潮劳改农场第二支队政委、农场基建部主任、农场副政委、农场政委兼党委书记。1956年3月，他被调任甘肃省水利局（厅）副局长（厅长），1960年任安西水利工程局局长，1961年1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定西军分区第一政委。

1983年5月，王国退居二线，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政法委员、顾问。1985年离休后，他全力投入原第十七路军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中。

1991年起，他历时多年辛勤笔耕，编写出版了长达40余万字的回忆录《无悔的追求》，追思了他60多年的生命历程。

2001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王国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8岁。

英勇机智的「耳目」

插敌「心脏」的「尖刀」

张梦龙

甘洒热血为情报

张梦龙（1915—1944），垣曲县皋落乡人，1939年任中条地委秘书长，1942年任太岳军区四分区参谋，1944年牺牲，年仅29岁。张梦龙出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县立师范学校。他天资聪颖，性情刚毅，幼时就有善心，每遇乞讨之人，常常给其饭食。

本村佃农刘清夫妇，年老多病，生活困难，张梦龙总会为他们送去饭菜，母亲阻止，他便以哭力争。

一次，张梦龙看见地主毆打交不起租金的孤寡老人王婆，便冲上去痛击地主两拳，随后搀扶着王婆，送她回家。

1932年，17岁的张梦龙在县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反对老城关盐商剥削百姓的斗争，接触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38年2月，张梦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调至县委机关任秘书。

当时的县委机关设在县委书记王唐文家一间低矮狭小的房间里。冬天，房里寒气逼人；夏天，屋内闷热难忍。即便如此，张梦龙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显示出惊人的革命毅力。

他多才多艺，擅长写作。当时的县委机关，就他一个人坚持机关工作，从起草文件、编写宣传材料，到刻蜡版、搞油印，再到将材料装订成册……无论是县委向上级汇报的材料，还是向下一级发布的指示信息和党员教材，均出自他一人之手。

此外，他还擅长刻印章。无论是县区机关的印章，还是为了便于对敌斗争仿刻的敌伪印记图戳，都由他亲手刻制而成。

他工作认真，要求严格。有时王唐文看他太累，就帮他刻蜡版。一旦发现印出的字迹稍有模糊，他便返工重刻。

当年，他刻印的著作用红色油墨印刷，字如米粒，鲜艳清晰，给阅读过这份作品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

1939年，张梦龙调任中条地委秘书长。1941年11月至1942年夏，张梦龙在《晋豫日报》任编辑，隐蔽在山村草庵里刻印报纸，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和机警。

1942年，张梦龙任太岳军区四分区参谋。其间，国民党中条山野战军贾真一部队和刘仰辰独立大队盘踞在垣曲、夏县、闻喜等县，张梦龙负责策反他们。

张梦龙受命于危难之时，依靠垣曲县委和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通过地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伪内部，建立起党委通向条西地委（由阳城经垣曲到夏县）的地下交通线，在敌据点内建立情报站，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军势力，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他经常告诫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面临危险时，即使砍头断骨，也决不能暴露党的机密。”他们就这样多年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着殊死斗争。

张梦龙一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任太岳四分区参谋后，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常在寒冬腊月里单鞋赤脚，有时几天吃不上饭也要坚持工作。

在与地下党情报站联系时，他十分机警，使用五倍子水等密写情报和接头的办法传递消息。

他还常让当时年过五旬的父亲张恩庆传递情报。他让父亲戴上旧风帽和老花镜，穿上黑棉袍，背上破搭子，破搭子内装上罗盘，扮作看风水的阴阳先生，穿行在敌占区。张梦龙曾自豪风趣地说：“共产党的策略里，还有利用父亲这一条哩。”

张梦龙带腿的小股武装，曾多次遇到日伪顽匪的阻击和偷袭，但他英勇机智，巧妙指挥，与敌周旋，一次次出奇制胜，化险为夷。

1941年，他带领4名战士到一个村庄接头，不料被贾真一部的200余人包围。

张梦龙沉着冷静地观察敌人火力，找准突破口，一跃而出，猛虎般地冲锋在前，弹不虚发，在硝烟迷雾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他率领4名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重围，竟然无一人伤亡。

1942年，为开辟条西根据地，张梦龙去条西联络各县游击队。完成任务归来途中，他被贾真一部队1000余人围堵。

当时，他仅带领十几人，枪支弹药也十分有限。他从从容静地指挥战斗，用冷枪消灭敌人；用伪装战术，把帽子顶在树枝上，举出草丛，吸引敌人不断猛烈射击，消耗对方弹药。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天，在张梦龙的策略下，敌人火力大减。他趁机集中火力，冲出敌人封锁，安全回到根据地。

张梦龙领导的地下情报站和小股武装，成了我党我军的“耳目”和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

他们搜集敌军情报，挖取敌人暗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除掉敌人的地下情报员，分化瓦解敌人武装，刺痛了穷凶极恶的特务头子贾真一。

贾真一是一个阴险毒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到处叫嚣：“共产党是草，老百姓是苗。分得清时，拔草留苗；分不清时，苗草全拔。”

1944年2月1日，张梦龙带领30余人到石窑村搜取了贾真一部队暗藏的部分物资。

返回途中，部队在槐南白村分三处宿营，他和另外两名战友王好治、王鸿庆宿营在南道凹。

敌人获得这一情报后，当晚，贾真一部队第三团分三路包围了张梦龙的住处。

次日拂晓，敌人先袭击杀害了我方哨兵，控制了制高点。接着，敌人又用机枪对准张梦龙的住房扫射，王好治不幸牺牲。这时，王鸿庆夺门而出，投弹突围，张梦龙也随之冲出。

越墙时，张梦龙不幸左腿中弹，无法行走，王鸿庆则当场壮烈牺牲。

紧急关头，张梦龙强忍疼痛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用火柴焚烧。随后，敌人合围追至，张梦龙陷于魔掌。

贾真一先是劝他投降，并以副司令的职位利诱张梦龙。但张梦龙横眉冷对、破口大骂，痛斥他们是汉奸、土匪，并且高声直言：“胜利属于共产党！”

贾真一恼羞成怒，拖着他的伤脚，将他带到槐南白村村北的一棵大树下，重刑毒打张梦龙，逼其投降。张梦龙高声痛斥：“要想叫我投降，除非日出西山！”

敌人大怒，残忍地杀害了他。

会议记录转呈我党 “三箭齐发”阻阎降日

樊耕农：隐蔽战线写人生

樊耕农（1915—1943），盐湖区寺北村人，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打入阎锡山部队内部，任民族革命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股长，并担任中共晋西特别组成员。他利用阎锡山高干会议办公室秘书这个有利条件，将阎部核心机密悉数转报党中央。1943年12月26日，樊耕农不幸牺牲，时年28岁。

1929年秋，樊耕农考入山西省立第二中学校初中部。

1930年，他参加了驱逐校长李敏的学潮。

九一八事变后，樊耕农发起成立运城学生抗敌救国联合会。

1933年9月，经张志善、李延河介绍，樊耕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七七事变后，樊耕农和王芷衡、屈斗三合作，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河东日报》。

1939年年初，樊耕农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4个月后，他返回山西搞统战工作，在中条山第七专区行政专员公署工作，担任《战垒报》编辑，负责编写战地新闻、撰写前线通讯。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在二战区内秘密建立中共晋西特别组，有组长杜任之以及组员樊耕农等人。

中共晋西特别组刚成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传来指示：“统一战线不会全部破裂，蒋、阎反动派还不敢公开向日本投降。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凡是可以在阎锡山阵营的同志必须留下，坚守这块阵地。”“我对阎锡山的方针是拖住他，不让他降日；支持他，不让蒋介石吞掉他。”

在杜任之的指导下，樊耕农草拟了《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宣传纲要》，提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妥协、分裂”。征得阎锡山批准后，这些内容被广泛宣传，扩大了统一战线。

1941年初，民族革命同志会采用高干驻会委员三人集体负责制领导日常工作。经杜任之运作，樊耕农担任高干会议办公室秘书，负责高干会议记录和撰写重要文稿。

此后，每次高干会议结束，樊耕农都会将阎锡山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决议，甚至讲话时的表情，全部写成情报转报党中央。

在当时的特殊年代，他们利用多方势力，有力打击了顽固分子和反动势力。

石楼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薄毓相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1942年

春，樊耕农率领秘书组到石楼县作战地工作，薄毓相却借机分化、拉拢秘书组成员参与反共。樊耕农依靠组内进步力量，同薄毓相展开了斗争，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潮。

这次风潮加深了薄系内部派与派、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大家相互攻讦、相互诬陷，也使薄毓相的丑恶面貌在派内外暴露无遗。

樊耕农将薄毓相拉山头、树旗号、建军队、割据地盘的事实密报给阎锡山，阎锡山立即将其调离石楼，削弱和打击了阎部的反动骨干力量。

1942年夏初，阎锡山准备公开向日寇投降。党中央立即指示：“阎锡山是个军人，公开投降，危害很大，必须想办法阻止阎锡山公开投降。”

于是，他们采取“三箭齐发”的措施，制止阎锡山公开降日：一是由王世英代表共产党对阎锡山进行劝诫；二是由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进行规劝；三是让杜任之和樊耕农变换字体，连夜写几封匿名信，最终迫使阎锡山不敢公开向日寇投降。

一次，蒋介石打着“抗日”的旗号加紧培训特务，樊耕农和杜任之向阎锡山力荐《革命生活》的编辑王观鲁前往受训，以摸清蒋介石的特务情况和训练渠道。

挑担贩菜送情报 寒冬蹚水运武器

张继先：智勇双全“黄瓜客”

张继先（1916—1999），稷山县苑曲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任地下交通员。他曾先后任汾南工作委员会通讯员、太岳地委汾南交通站交通员、稷山一区区委书记、太岳三分区干部学校总务科科长、稷山二区区委副书记、稷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日军侵占稷山。敌军封锁交通，给地下党组织的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全县建立几个交通站，苑曲交通站就是其中之一。

苑曲交通站交通员张继先机智勇敢，利用贩卖蔬菜的机会，与敌人巧妙周旋，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黄瓜客”。

当时，日军封锁汾河桥，苑曲交通站负责汾河两岸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由张继先担任交通站的支部委员兼交通员。

为了行走方便，他以贩菜为掩护，进行地下联络工作。在送信过程中，他一方面要应对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搜刮；另一方面根据信件地址，

挑着菜担子走街串巷，无论贵贱都要把菜卖出去。

为了做好地下工作，他的贩菜生意常常赔本。张继先的家人便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用于贴补贩菜生意，这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当时，县委驻地设在桐下村。若肩上的菜担子空了，极易引起敌军怀疑。

为了隐蔽身份，他不得不以高价在桐下村附近的甘泉村承包一块菜地种黄瓜。就这样，他担着黄瓜在汾南、汾北来回奔走。

若在日本兵岗哨卡住了，他就拿几条黄瓜塞到人家手里。即便岗哨不让过，他也送几条黄瓜。

在这种情况下，张继先既隐蔽了自己，又保证了县委和汾南党组织的联系。

1941年的一天，汾南交通员转来一个加急信件，要求张继先立即转送，信是用白矾在纸上写好后再用金纸包上的。

他接到信件后，急忙挑起菜担子就往汾北走。

过桥时，正赶上日军拦路搜查，抓苦力修炮楼。面对突发情况，张继

先陷入两难。若往回返，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若继续往前走，敌人搜查时一旦发现了这封信件，不仅自己会被杀头，而且还会株连全家，更重要的是会让党组织遭到破坏。

危急关头，他灵机一动，将信件往嘴里一塞，压到舌根底下，挑着菜担从容地走向岗哨。

日军将他的衣服脱下，对他进行全身搜查。

由于没有发现问题，日军让他和其余被抓来的人站在一起，准备押送他们去做苦力。

此时他想，若被敌人带走，不知何时才能被放回，组织上的信若送不到，会耽误大事。于是，张继先在心里思考逃跑计划。

机会终于来了，押送途中，由于日军抓的苦力很多，他趁敌人不注意，装作解手隐藏起来。待敌人走远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急忙把信件从嘴里取出来，迅速绕道送到桐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手中。

作为一名交通员，张继先既胆大又细心。

1943年10月，汾北地下党搞到了

4支步枪、2支手枪、200发子弹和十几颗手榴弹，上级要求把这批武器转移到汾南，支援稷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张继先接受任务后，与支部同志共同研究转移方案。由于桥头有敌人岗哨，他们只好在夜间蹚水过河。

一天夜里，张继先与支部其他同志约定暗号后，一起赶到汾河岸边，由他先蹚水到汾北，找到地下党组织，其他同志将武器护送到汾北河岸。汾南、汾北的同志接上暗号后，再将武器转送到汾南。

时值初冬，河水冰凉，寒气逼人，稍有不慎就有被淹死的危险。

等他们艰难渡到河岸，已是夜间两三点钟。他们顾不得寒冷，和同志们一起把武器隐藏在苑曲村天庙关云长神架下。

为了安全，他在庙门口留下记号，每天装作拾粪暗中察看，根据记号变化分析情况。就这样，半个多月后，武器终于安全转移到人民武装手中。

地下交通员张继先与敌人巧妙周旋的故事，在苑曲一带久久流传。

本版责编 苏黎原 曹欣怡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李静坤